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
陈漱渝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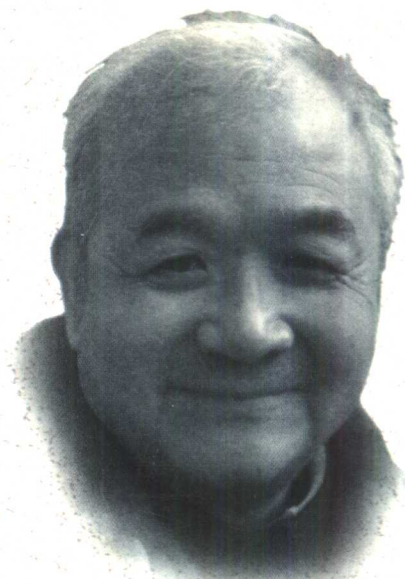
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

解读

萧乾

J I E D U X I A O Q I A N

傅光明 / 编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化现象

解读萧乾

傅光明 编

陈漱渝 主编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解读萧乾/傅光明编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1.3

(中国当代文化现象)

ISBN 7-80094-430-1

I. 解…

II. 傅…

III. 萧乾—文学研究

IV. 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305 号

责任编辑:寿 申

解 读 萧 乾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375 字数 345 千字 插页 2

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3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 册

ISBN 7-80094-430-1/I·259

定价:22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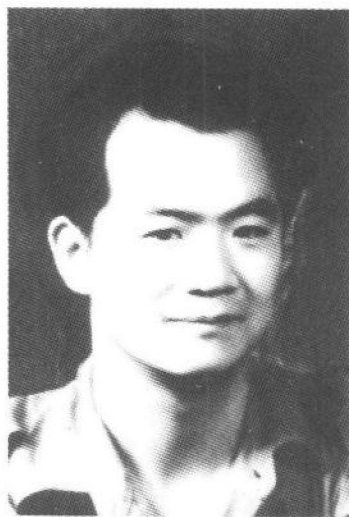
联系: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部 电话:84040746



1927年,萧乾在崇实中学
和几个小伙伴组织起“少年互
助团”



1928年在汕头初尝失恋的苦味



1944 年秋, 穿上“战地记者”服摄于赴欧陆之前



1945 年 9 月,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 作为战地记者的萧乾, 登上阿尔卑斯山喝一杯啤酒



1946 年秋,搭资源委员会专机与吕德润赴台湾采访



1991 年,摄于零乱的书房

前 言

——我所认识的萧乾

傅光明

一、“理想国”的遥远梦影

萧乾虽出生于宣统元年，但从懂事起就一直是共和国的公民了。以他最起码的政治常识，帝制与共和的区别首先在于：前者是一个人或其王朝说了算，而共和则是每个公民都应有发言权。

然而从 20 年代军阀混战到 30 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不是张作霖、吴佩孚说了算，就是蒋介石说了算。遇有不同的声音，轻则失踪判刑，重则“饮弹龙华”。邵飘萍因言论而遭军阀枪杀，萧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纪因参加共青团而被关进张作霖的侦缉队，要不是被他就读的教会学校的洋校长保释出去，也难保不丢命，因那是个可以不审就随便枪毙人的地方。所以他说，1939 年他不是从一个共和国，而是从一个实质上是帝制的国家前往英国的。看到人家的领导靠选票上台，不称职的可以罢免或下次不选；看到即便在战时，那里的人民也言者无罪，对不适当、不合时宜甚至不顺眼的事，即便对首相指名道姓地痛斥，也不至关监狱，更不会失踪，自然好生羡慕。

叫他更难以理解的是,不但民间可以畅谈国事,甚至正当英国独自在对德、意法西斯进行民族存亡殊死战的时刻,伦敦居然还在公开发行着两家反战的报纸:一份是从宗教上反战的《和平新闻》,另一份是拥护纳粹盟友——苏联的英共机关报《工人日报》(当时苏联与纳粹签了友好协定)。丘吉尔首相迫于舆论的压力,曾向一位因在言论上与政府唱了反调而受处罚的老人赔礼道歉。换个地方,这两份报纸即便政府不禁,民众也会把它捣毁。

萧乾看到二战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,其次才是武器优劣。在他心目中,言与行是很难分的。大敌当前,除了奋起抗敌的主流之外,竟然还有唱反调的,国家处在生死关头,却出版反战报纸,鼓吹和平,还不构成叛国行为?然而不,那自然会为正义之声所压倒。德军飞机来袭,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电,即便出于疏忽,也轻饶不了,会处以重刑。而出版反战报纸,仍属言论,只能容忍。

由40年代萧乾从英国发回的通讯特写看,对民主、法制的肯定和对言论自由的提倡是贯穿始终的主题,其中尤以《舆论·广播·宣传》和《瑞士之行》为最。

瑞士在当时可说是欧洲最稳定而团结的国家,然而它却是由三四个不同民族,且各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组成。萧乾甚至觉得,同文同种也并非一个国家团结统一的首要条件。他感到是瑞士坚固的民族制度,把不同民族的人拧成一团。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,谁也不是发号施令的主子,谁也不是奴才。社会上,政坛上,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,经过激烈的辩论,最终达到一致。《瑞士之行》便集中流露出他对这种民主自由气氛的羡慕。但很快,他就认识到,他对瑞士的民主吹捧过了头。

《舆论·广播·宣传》则更以许多实例来说明,越是国难当头,

越要讲求民主。越是同集权的纳粹作殊死战，自家的民主传统越不可丢。否则，这战争就没有了意义。这表明，越讲求民主，人民就会越拥护政府，因而国力就会更强大。

但作为一个东方人，萧乾直到晚年仍不认为我们应把民主自由的尺度放那么宽。我们像 40 年代的反纳粹战争一样，许多地方仍在同贫穷、愚昧、野蛮和落后作着殊死战。绝对自由是太奢侈了，但在共同目标下，不同的声音还应是被允许的。为统一口径而堵塞言路，得不偿失。

不难看出，晚年萧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已经打了折扣，而他在 1946 年到 1948 年那段时间，确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。从他这两年间写成的以《红毛长谈》为代表的杂文和为《大公报》所写的上百篇社评能证明，他当时真的是把自由主义当成一种理想，一种抱负，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。

二、反讽：一把幽默的手术刀

《红毛长谈》是萧乾作品中一部极富特色的政论讽刺杂文集，经历了欧战风云的萧乾从英国一回国，就陷入一种极度矛盾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中。到上海以后，他便想以洋人文白相杂、似通非通的文字写个专栏。这样，既可以隐瞒身份，本身又带上些滑稽色彩。他当时正处在迷茫时期，旅英七载回来看到上海特务横行，深恶痛绝。他和第二任妻子谢格温的家就在深夜无端遭到过特务的骚扰。另外，他当时一心只反内战，根本没什么阶级观点，仅求不打仗，国人平安过日子。再者，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，看到太多不顺心的事，因此就在文字中以乌托邦的形式构造起自己的理想国，实际是梦想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。

《法治与人治》是《红毛长谈》的开卷首篇，写于 1946 年秋。文中暗示国民党以防乱为名，向共产党的解放区进攻，挑起内战，而在宣传上却力避使用内战字眼，以逃避罪责。他谴责国民

党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，为维护自己统治，消灭异己当然是最好的途径。控制了新闻媒体，欺世瞒人也来得容易。“中国人向来择词谨慎，盖任何欧西国家，大乱之后，如他国平静无事，埋首建设，而已国乒乓不息，必坦然承认起了哄，此丑貌，虽纽约五街之美容专家亦难装饰者也，该国精力亦必倾于消解内哄。而贵国独与内战与内乱间作字句之斟酌。此足证贵国人士对文字之敏感，慎重，有分寸也。”另外，“贵国虽为古老文明，而仍不失少年之战斗性，此亦研究汉唐文化之欧人所意想不到者也。”对于这种内战纷扰，每每念上一通可使国家个人种种问题都必迎刃而解的“国父遗嘱”是不起任何作用的。在红毛笔下，上海大世界可真荣光万分。“每遇红毛记者，辄称之为伟大的同情者。满城悬旗欢迎，小学生列队呐喊，这当是政府主使所为。而一旦红毛措辞不恭，便不准其发电报。事实上，红毛记者之奉命来华，无异于三轮车自外滩而南市，职务所驱使者也。”

红毛自称来自欧洲人种文化宗教最复杂的一角，深知中国没有天主、东正等新、旧教之分，且疆土广阔，文化同一，应是得天独厚的。所以内战起伏，妨碍统一，人为之也。同时，“阔家小姐少爷极尽奢靡，沪埠之流线汽车，大饭店餐馆之玉杯象箸，室装溺器，可与秦阿房宫相比而毫不逊色。”寻常百姓，没有金条，是住不进亭子间的。难怪红毛慨叹，中国“精神上所缺者为公德守法，而物质最缺者，厥为屋顶也。”

不难看出，文章挖苦了国民党用念遗嘱代替建设，对洋记者一面溜须拍马，一面又不许报道事实真相。同时，痛斥上海阔家公子小姐的糜烂，以及没有金条租不到房子等国统区的情况。

萧乾在文中流露出的反讽技巧常令人钦佩，例如文章最后那段深含哲理的幽默讽刺：红毛在林中散步，被凭空扑来的一黑白犬在“余小腿肉厚处狠狠咬了一口。余忿然质问：汝兽类，奈

何凭空噬我一口乎？犬夹尾答曰：我不咬你，你必举足踢我矣！故先发制你。呜呼，此中之悲剧也。”这段人兽对白，无疑是篇中精华。人无信任，犬无保障，便都会“先噬人以卫己。拥上前去以免落后，社会秩序势必愈闹愈乱。思故中国问题之根治，在终止人治，施行法治也。”这自然是萧乾的善良意向，希望国共双方避免内战，化干戈为玉帛，绝不能狗一般凭空扑咬。“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。避免在法治掩护下继行人治则恐尚需时日耳。”

《中古政治》是红毛的第二篇杰作，它以当时的中国不配法西斯化，反讽中国的政治体制依旧停留在中古时期。其实，萧乾的用意并非仅限于此，他从多方面对比了国民党与德国纳粹的异同，从另一个侧面揶揄中国竭力讨好、奉承外国记者和外交官，“在欧美大都会华丽旅馆请鸡尾酒，重资津贴红毛职业文人写誉华文字，”试图在国际社会确立中国如何民主的形象。同时讥诮中国在一些方面尚不如法西斯。“夫法西斯者，一套政治机器也。中国生产未机器化，政治亦依然徘徊于中古时代。”

萧乾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国比成一个发育不健全，营养不良的畸形儿，“太穷，需仰仗他人扶助，太弱，不敢向举世挑战。”她渴望着健壮和强悍，无奈自身百孔千疮，不得不靠正常的民主国家救济和保护，撑起门面，以求在畸形中继续畸形地发展，不致沦落消亡。

这当然还只是中国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，根本原因则在“贵国人民之素质”。红毛凭着阅史书和与人接触，断言中国人民深入的个人主义气息，“乃法西斯化大家最无办法之事也”。

法西斯化重纪律，尚英雄崇拜，把整个国家几乎变成一座兵营，人人都有尚武精神。而中国人则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耕田，吃饭，拉屎，生儿子，病了吃药，死了入土；袁世凯可来，张宗昌可去，而中国农民却最后仍是主人。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表

明中国不太可能法西斯化，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是法西斯化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。那种传统的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生哲学在中国人脑中根深蒂固，不管你以什么主义、什么思想或任何意识形态相加，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封闭在土生土长的故土家园。

三、权利是把双刃剑

很显然，西方的个性主义与中国的个人主义形成的基础不一样，表现出来的方式也迥然不同。个性主义无疑是民主国家的产物，它以人权为基础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秩序里享有充分的个性权利。而个人主义却是专制集权的衍生物，一个人的思想便是所有人的思想，一个人的权力便是所有人的权利，决不许个性权利有任何生存的空间。换言之，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，在民主国家，个性主义得以张扬。也许人们的灵魂中都有一块个性主义的自留地，只有遇到适合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雨露，才会长出茂盛的庄稼。那便是萧乾所希望的，把中国的个人主义民主化。

“夫交通灯者，民主政治中之制度化也，而交通灯运到贵国改由警察开，也有如外国总统制运到贵国即变成袁世凯之皇帝一样也。”萧乾饱汲中西文化，对中国变换西方民主制的技法颇为了解，他以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来暗示，任何民主的东西到了国民党手里都会变样，交通灯、总统制仅是一两个方面。

萧乾意味深长地指出，交通信号的颜色全是由人来规定，红色危险，绿色安全，找不出什么理由，倘若哪个地方硬是规定红色安全，那绿色便被视为可怕了。总之，这是文明社会的规定，在红色与绿色中间，还有一过渡的黄色。他把这三种颜色分别比作国民党、国共之间的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。国共双方到底哪边为红并不重要，也没什么意义。重要的是，黄色的存在本身

意义不大,但其作用却在避免撞车惨祸。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也大致如此,他们虽不能阻止内战的发生,更不能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,却可以起到缓冲作用。正因为此,“国共双方才在两路口皆堵住庞大卡车之今日,尽力争取黄色为己用。黄色或足以避免血肉飞溅之悲剧也。”而当红、绿灯交相争艳,国共重燃内战烽火时,黄色就没用了,只能瞠目而视。所以,“此并非法西斯政治,而是中古时代之蛮性政治而已。”

萧乾把交通灯下的警察比作当权者,他在纷乱交通的喧嚣声中,伫立在太阳下,也算受尽了辛苦。即使为了那可怜的警察,也希望中国的政治交通加速自动化。萧乾以一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柔弱之笔,透过一连串的比喻,剖析了当时中国政治交通的混乱及根源。真正的出路在哪里?萧乾的答案是:需要的是容忍,守法,和一颗公道心!但他随即慨叹,“中国的交通灯制已非局部改革所能为”。他把中国如何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动化交通,即民主的秩序,留给了政治改革家。

四、“超阶级”的困惑

《半夜三更国际梦》是《红毛长谈》中篇幅最长的,它不单记录了红毛的一夜三梦,更是对1948年前后中国国内政局,以及世界上几大强国为在中国获取巨大利益精打细算,互不相让的表演所作的专论。尽管文中都是梦中呓语,“各电皆系敝毛所杜撰”,但萧乾“超阶级”反内战的倾向显而易见。忧国忧民的萧乾以其超凡的国际事务洞察力,近似荒诞的笔墨,描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国际舞台上的被动尴尬地位,国共间持久不停的内战所造成的深重损失和混乱秩序,对未来中国提出了乌托邦式的设计,以此渲泄强烈的反战情绪。同时,表达出渴望和平、向往民主的自由思想。

“俗语云:夜长梦多。夫梦者,昼间下意识有所思,而夜眠织

成之花样也。”萧乾是做梦高手，一夜三更全是洋洋洒洒的国际政治梦。曹雪芹《红楼梦》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；这篇也能算是满腹荒诞梦，一片赤诚心。

据说此文发表时，各界反应强烈，积极呼吁早日结束内战。对于这第三次国内战争，萧乾是纯从中性的“超阶级”立场出发，对国共双方不偏不袒，各打五十大板。他不管哪家正义，对他而言战争本身就意味着屠戮。正像他后来深刻检查的，他秉承的是《大公报》的不党不派，崇尚自由、民主、和平，反对以任何借口、旗号所进行的战争。

萧乾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，一是对旷日持久的内战痛心疾首，并一再以反讽的语言暗示，如此下去，内战所造成的损失只会比日本人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更大，灾难更深。同时，以编造的电文，杜撰的荒诞不经的事例，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假想，指责国共双方不顾国际舆论，一味打内战。另外，国共针锋相对，却也有相通处，如都认为国共逐鹿纯属内政，不希望别国干涉；各以不同的方式都欲置对方于死地，夺取政权。

二是要表达民主思想。萧乾在文末假拟一份国际社由汉城发来的电文，对未来中国提出了天真的设想：封锁全部中国口岸，速将双方军队缴械等消极方面当不可取，但方案的积极方面似还是较为理想的，如“首为成立联合国代华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，以美苏英法为常务理事。民族组工作为阻止任何外国人员干涉华事。民权组工作之初步，系严格禁止警察无故搜查人民住宅，并认真实行身体自由法。第二步为尽量减少党报及政府报纸，鼓励民间办报，并保障其言论自由。同时筹备大选。过渡时期，应开放政权，由各党各派参加。”另外，文中还提出了认真办理各种税收及社会保险，发展教育，增进中国人健康的措施。这可以称得上是萧乾想像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雏形了，是

他的太阳城。

《红毛长谈》接下来的几篇,《玫瑰好梦》、《神游大西南》、《二十年后的南京》、《新旧上海》及附录中的两篇《中国舞台的歧途》、《中国音乐往哪里走?》,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,那就是针砭国民党的独裁专制,勾勒以英美民主政治为蓝本的乌托邦理想国。萧乾把蒋介石与中世纪权力无边的罗马教皇相提并论,把当时冥顽不化的中国喻为一座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民生四不像的舞台,政治仍停留在半蒙昧状态。他还巧妙地以中西音乐之比较来观照中西政治的差异:一是西洋音乐注重和谐,中国音乐有调无谐;二是欧洲音乐有固定乐谱,而中国音乐则没有乐谱。

西洋音乐围绕一个主题,可使不同的乐器发出自己不同的音调和抑扬,使主题更加丰满突出,听者能从千百不同腔调中,捕捉到一个总印象。这是西方多元政治的象征。而中国人认为音乐美在乎齐,为了一个主题,乐手们不是像西洋那样追求曲折错综的变化,而是机械地望着独裁胡琴手的脸。萧乾以此引申西方社会,可以不受束缚地畅所欲言,而在中国,蒋介石这专横跋扈的“胡琴手”强奸民意,扼杀舆论,只许齐,不许异。

欧洲音乐有固定乐谱,意指欧洲政治是依法办事,一切按既定的乐谱(法律秩序)。“中乐之有调而无谐,造成了中乐无谱的惨痛事实。”就是说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是造成当时无法可依的元凶。更为可悲的是,“今日既有乐谱,也未必去遵循的了。”无法即自由,造反就有理。在粗暴的鼓槌之下,美丽淳朴的国风变成了阿谀帝王的媚语;那欢喜的婚礼,却变成了杀气腾天的擂台。中国音乐史上再找不到比这阶段更恶劣的了。

五、自由主义:一朵璀璨的罂粟花

萧乾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杂文中还是多以隐式的暗喻来表达,到了社评中,就如山洪决堤般一泻而下,淋漓酣畅。人类是

有理性的，人类所追求的应该是一个充溢着理性、公平、自由、合作、互尊、互爱、和平、富足的世界。

萧乾社评最根本的基调就是反对战争，向往世界和平。他痛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梦想者，更害怕美苏那样的强国准备战争。二战结束后，谁不渴望永久和平。但日本投降后，国内没有重建家园，人民几乎未得到休憩喘息，便重又陷入悲哀。萧乾“超阶级”的反战思想在《我们要求向前走》中表露无遗，在他眼里，和平是比任何主义、政党更崇高的真理。他谴责国共双方嘴里都在高喊和平统一，实际上却真刀真枪，各不相让。他并不考虑什么主义才适合于中国，他以为只要能使人民在和平环境下幸福、自由、民主，那就是好主义。主义在他是个让“野心家雀跃使民众寒心的响亮名词。它好似替代了帮会的堂号标识，同志也罢，信徒也罢，它的后面永远离不开一簇共生共死的盟兄弟，以拼命精神去打天下。一般人因此竟忘记主义的最初意义原是一种对人生的态度，一种基本的信念，政治不过是整个人生的一环。”因此，萧乾的向前走，就是要让中国向和平统一的轨道迈进。然而向前的宣言、呼喊、保证，“旧金山、伦敦、巴黎都喊过，南京、延安，甚至战场上，口口声声都不离拥护和平，实行民主。今日世界，是彻底言行相远的世界。在和平的橄榄叶下，千万健儿送了命；在民主的神圣保障下，千百刊物被封禁。”中国就如一辆古老的篷车，方向不是向左，就是向右，要纠正到向前走，便需在大的方面，一要治愈战争的创伤，二要抹去政治斗争给人们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。”

《圣与雄的分水线》则从历史的角度，以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为例，分析圣与雄本质上的不同。萧乾认为，中国人的血液里，流淌的多是率领子弟打天下的项羽式的英雄。而项羽与虞姬的末日同希特勒与爱娃的终局何其相似。他们两对痛快了一